

了了录

蓝翎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责任编辑：曹礼尧

了 了 录

蓝 翎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30 千

1983年1月第一版

1983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800 册

书号：10118·056

定价：0.67 元

DF53/32

目 录

有感于杂文的兴废（代序）	1
了了录（一）	21
了了录（二）	25
论吹牛	32
也谈张果老倒骑驴	39
话说文艺刊物和编辑	42
漫话古今考场案	50
读书与掘井	62
从天花绝迹谈起	64
谈历史上的冤案	66
无题有感	73
读余遐思（一）	78
读余遐思（二）	86
为文艺评论说句话	91
从神案前站起来	95

小轿车与轿子	102
瞧瞧“走着瞧”	106
从海瑞的“家伙”单想起	110
“一言堂”追根	119
山东馒头山西面	123
——作家风格小议	
山药蛋与荷花淀	126
——文学流派小议	
“看不懂”的推想	130
“看不懂”的再推想	133
昏中有明	142
——谈晋剧《下河东》中赵匡胤的塑造	
看京剧《李慧娘》的杂感	145
常香玉印象散记	152
安息吧，吴恩裕先生！	162
沿着茅公的路	169
“争鸣”与著作	172
“高低贵贱”论	175
笔下有冤魂	177
“优待证”异议	180
“几句原则话”	183
如此“指导”	185

释“妙哉”不妙·····	188
辫子的长短·····	195
半间房随笔·····	197
渐入净化境·····	199
——文苑三舍外揣古	
“以人绳己”论·····	202
探求与追随·····	206
草根·····	208
渔箔·····	212
爆竹声声·····	216
幕间谈戏·····	221
长诗短谈·····	226
相声的相·····	232
——“侯派”一斑谈	
富有热情的艺术创造·····	236
——听曲随感	
可喜的成就·····	240
——谈河南坠子《闹场院》	
后记·····	245

有感于杂文的兴废（代序）^①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战线越来越呈现出欣欣向荣、百花争艳的局面。好的小说，好的诗歌，好的散文，好的戏剧，越来越多。但从个人的感受讲，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值得谈谈的现象，那就是杂文也越来越多了。报纸上出现了杂文，而且有的还辟专栏。文艺刊物上大都有杂文，有的也辟了专栏。作为一个中年读者，对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并不陌生，而对于杂文，老实讲，只能感慨地说句日常客套话：“久违了。”久违了于今又喜相逢，好不好呢？那当然好，好得很！

杂文多了有什么好？首先不是好在杂文本身。杂文本是一朵花，但也有刺，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

^① 原载《当代》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欣赏的。现在报刊敢发表杂文了，作者敢写杂文了，读者敢读和议论杂文了。试想，这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行不行？在人们不敢讲真心话的时候行不行？在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的人控制舆论阵地的情况下行不行？不行的，肯定不行的，寸步难行也。杂文多起来了，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是发扬民主的结果；反过来，杂文又是推动思想解放和发扬民主的武器。所以我说杂文多起来了好得很。

杂文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杂文的产生已经有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有着光辉的战斗传统，建立了丰功伟绩。杂文应该得到健康、顺利的发展，应该得到同其他文学形式平等的待遇。然而，多少年来，杂文却命运多乖，多灾多难，时兴时废，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没有人主张过废除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可是在报刊上杂文就不能经常存在，有时出现一阵，有时不见踪影，没人下命令，而步调却非常一致，真是一种奇怪的矛盾现象。

怪在哪里呢？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才好。

二

杂文的兴废问题所以存在，大概与对杂文特

点的理解有关。所以还得先正名，以达到名正言顺。

杂文是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新形式，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是适应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历史潮流而产生的，因之杂文也成了科学与民主的武器。杂文的开山祖当然是伟大的鲁迅。鲁迅的许多杂文就发表在五四运动重要的舆论阵地《新青年》杂志上。鲁迅的第一部杂文集是《坟》（有的说是论文集），收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的作品。其中写于一九〇七年的《人之历史》等四篇，大概不能算杂文，那是名副其实的论文。第五篇《我的节烈观》写于一九一八年，从这以后的就是杂文了，因所谈的社会问题与同时期的杂文集《热风》的内容大体相同、相似、相近，风格也一样。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的近二十年间，鲁迅一直没有中断杂文的创作，而且越到后期成果越辉煌，这已经成了文学史上的常识。

鲁迅的杂文集，是按年编辑的专著以外的著作，其中有的并非杂文，如关于古代小说的研究等。我们经常所说的鲁迅的杂文，主要指的是象随感录等对于社会现象的短评。鲁迅自己也是把这样的文章看作杂文的。以后相沿下来，一提杂文，就是指这种文章。鲁迅对杂文特点的看法怎样？概括

地说就是以讽刺的笔法，“对于时弊的攻击”。鲁迅所说的“时弊”，就是体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的种种反动现象和落后现象，它们有的赤裸裸地体现在敌人身上，有的则曲折地体现在朋友身上。这种种反动现象和落后现象，阻碍着社会的进步，阻碍着人民的解放，阻碍着民主和科学的发展。鲁迅的杂文以此为攻击对象，只要这种种现象仍然存在着，鲁迅式的杂文就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鲁迅说得好：“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热风·题记》）杂文就象白血球，白血球的天职是吞食病菌，因此有病菌存在，白血球就万万不可废除，这与嗜痂之癖不同。鲁迅写杂文，鲁迅的杂文影响了一批鲁迅式的杂文的产生和发展，从五四前后一直到全国解放，杂文没有中断发展，以匕首对“刀丛”，展开了白刃战，“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那不民主的制度死亡。”杂文在搏斗中求生存，在厮杀中得发展，得兴旺，配合整个革命的历史洪流，在摧毁旧社会的斗争中发挥了自已的作用。杂文以战斗的业绩形成了光辉的传统。

杂文的前三十年，始终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的

一个组成部分，虽遭压制，作者并没有废除它。

三

抗日战争期间，一九四二年，在革命圣地延安，文艺界曾对文艺问题进行了一场争论和探讨，其中也涉及到杂文问题。毛主席对这场争论和探讨作了总结，写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它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纲领，为革命文艺开辟了新时代。毛主席是肯定杂文这种讽刺文学形式的，并对鲁迅的杂文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一个是态度问题，不能乱用讽刺。再一个是写法问题。在解放区，不能简单地模仿鲁迅的杂文形式，“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为什么？因为给了作者以民主和自由。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都有了生气勃勃的新发展，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美术、曲艺，都产生了大量的新作品，甚至与杂文的讽刺特点相近的漫画，也有了崭新的变化。然而惟独杂文却没有发展起来，直到目前，还没看到

编出《解放区杂文选》。这总不能说是符合毛主席讲话的精神的吧！应当说是个缺点，是个不小的缺点。

就延安关于杂文的争论和探讨所涉及的问题看，主要还是认识问题，思想问题，是对于一个具有不同于其他文艺形式的文学形式的看法问题，它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敌我问题。提出问题的人并不反对革命，并不反对共产党。那么，在政治上、文艺上有了明确的回答以后，为什么反而又回避杂文问题，不再动笔或很少动笔了呢？恐怕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杂文写的主要是反动的、落后的东西，或者革命内部的缺点错误，是反面的东西，不是正面的东西。这样就容易牵涉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歌颂与暴露是文学创作上经常存在的两种现象，是从作品的题材来区别的。毛主席指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作者的态度问题、立场问题，也就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歌颂谁、暴露谁的问题。但是，毛主席并没有区分二者的高下优劣，相反的是肯定了二者都是需要的。如果我们承认事物是由矛盾的两个方面组成的，承认社会生活中有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真善美与假恶丑，那么就应当承认歌颂与暴露的作品和写法同样需要。然

而由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偏颇，所以就很自然的把讽刺反面现象的杂文看成“暴露派”。谁愿当“暴露派”？而当“歌颂派”则自以为比“暴露派”优越或者保险。背后呢？“歌颂派”是当然的左派、革命派，“暴露派”就未免有右的嫌疑，还是少沾边为妙。这样说不是故意给谁栽赃，在长期的文艺工作中，这种潜在的意识不是经常起着作用吗？今天有人提出“歌德与缺德”的问题，就是这种潜在意识的公开化，也是合乎逻辑的发展。

另一个是，如果是“歌颂派”的创作有了问题，哪怕是说上一千遍一万遍，也无所谓，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问题多严重，也拉不到政治上去。如果是“暴露派”的创作有了问题，那就不得了，一下子就上了政治纲，“一入深渊，万劫不复”，而且随着以后的政治运动的需要，还会逐步升级。延安发生的杂文问题，本来已作为认识问题解决了。不料十五年过后，竟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升级了。再过十年，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升了一级——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升得高，跌得重，现在又恢复到原来的地方，然而教训沉痛啊！

也许有人说，当时写杂文的有坏人，如王实味。答曰：有坏人利用某种文学形式，并不会影响这一形式的兴废。反问一句：文学艺术哪个领域里没混

进过坏人？又岂独杂文。再进一步，哪种职业里没混进过坏人？连党内都混进过大坏人。难道我们就不革命不要党了吗？

左“右”，右“左”，左比右好，越左越好，杂文的兴废与此大有关系。

四

解放初期的几年间，报刊上并没有名正言顺地提倡和刊登过杂文。但的确有一种文章应属于杂文，如曾经起过广泛影响的马铁丁的《思想杂谈》。然而人们却不把它当作文艺战线上的一朵花，即使由国家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仍然是被看作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短论，讲文艺学的人更没有把它放到文学的范畴里去。所以我说那些年间实际上等于没有杂文。

这期间，报刊上却有另一种讽刺性的“小品文”，但它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小品文，（鲁迅就曾经把杂文称作“小品文”）而是从苏联进口来的形式。所谓“小品文”，是以真人真事为内容的，尽管采取了文艺的表现方法，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则必须由所涉及的有关单位党委核实后才能发表。作为文学形式，这种“小品文”的路子太狭窄，不利于被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所掌握，报刊上也不会大

量刊登，只能偶一为之，所以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影响也有限。按其原来的性质讲，“小品文”是一种新闻手段，不是文学手段，因为当时被奉为这方面权威的，恰恰是苏联《真理报》的“小品文”专家萨斯拉夫斯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了一九五六年，“小品文”就被大量兴起的中国小品文（杂文）取而代之了。

五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各式各样的杂文，突然兴旺繁荣起来了。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我国开始转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从七月一日起，以横排八个版的新面貌出现了。第八版是文艺副刊，它以加花边的醒目地位把杂文放在头条。应该说，在大胆地提倡和刊登杂文这一点上，是起了带头作用的，打破了忽视杂文的偏向，继承和发扬了杂文的光辉传统，在新时代里开辟了新局面，推动了全国报刊上杂文的兴旺繁荣。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出现了以专登讽刺作品的大胆泼辣的《辣椒》副刊，就是最生动的一个例子，它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赞赏。

杂文的兴旺繁荣，证明了我们的文艺界有雄厚的杂文创作潜力，也有强大的杂文创作队伍，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的杂文传统在新形势下的继承与发扬。

那时候，杂文的作者是心情舒畅地写文章，态度明朗，直抒胸臆，有感而发，言之有物，切中时弊，毫无“预悸”，更无“余悸”。老一辈带头写杂文，中年一代重新拿起笔，青年一代依样画葫芦，跟着学。笔者当时就属于画葫芦辈的，并且一度当了专职的杂文编辑。就我所经常接触或拜读了手稿的文艺界的杂文作者，就有郭老（聿子）、茅盾（玄珠）、叶圣陶、巴金（余一）、夏衍、艾青、巴人（马前卒）、郭小川、陈笑雨、唐弢、曾彦修、秦牧、秦似、平心、徐懋庸、臧克家、吴祖光、李健吾、高植等前辈作家，以及我的老领导邓拓、林淡秋、袁水拍、袁鹰等。杂文的创作也是高产的，有的几日一篇，有的一日几篇。这样的兴旺局面怎不令人高兴呢？

那时候，杂文的题材也是多样的，有对敌人的，也有对人民内部的，而且后者是主要的。谈的什么？从国家大事到社会风尚，无所不有，而突出的是集中对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批评。这并不是作者的主观想象，而是社会生活中客

观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毛主席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认为它是不符合党的优良传统的，要“切实反一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九六页）。后来开展的整风，就是要整掉这些东西。杂文针对这些，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是完全符合党的需要的。

巴人曾经写了一篇很引起读者注意的杂文《况锺的笔》。那是名副其实的随感录。台上正演着昆曲《十五贯》，苏州知府况锺奉命监斩，手中拿起朱笔正要点下去，人头眼看要落地，忽听两名青年男女死囚的呼冤声，于是迟疑了一下。但一想，自己的职责是监斩，非审判，二次提笔要点下去，可是却发现了此案的疑点。然而监斩时间已到，错过了要受处分的，三次提笔要往下点。正在这时，他最后下了决心，要为死囚辩冤，使他们在自己的笔下超生。况锺的笔三起三落，巴人在台下议论风生，联想到我们各种工作岗位上都经常用笔，那么，是不是都象况锺那样慎重的笔下留神呢？能不能从况锺身上学习点认真负责的精神，使工作做得更好些呢？散戏以后，《况锺的笔》就很快写出了。这虽然也是联系时弊，有点刺，但不是冷嘲热讽，完全是善意的热诚的规劝和提醒，是对人民的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况锺的笔》代表了当时绝大

多数的杂文的特点。但是，万万没有料想到，作者后来却冤死在别人的笔下！可见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也会出现笔下有冤魂的悲剧，而且不止一个。由此也可见，巴人写那篇杂文是有胆力有灼见的。

杂文的兴旺繁荣，为文艺花园里提供了新花，也是毛主席刚刚提出的“双百”方针的具体表现。没有“双百”方针，人们的思想不解放，报刊怎能大胆地往外放杂文，作者又怎么能敢大胆地写杂文？那么，杂文究竟是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而产生，还是逆历史的潮流而蠢动，不是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吗？然而，好景不长，紧接着一场颠倒是非的大围攻，就把杂文给废除了。

六

“双百”方针一提出，就有人想不通，有阻力，一旦看到文艺创作突破了某些老框框，出现了新东西，就很不顺眼。看到题材多样了，就气愤地责问为什么热衷于“家务事、儿女情”？看到接触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就怒斥是“暴露黑暗”的再现。杂文当然也难逃谴责，压力越来越重。

首先感到压力的是作者和编辑。一篇杂文，总要涉及到具体的职业、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人和事，哪怕不写出真名真姓。比如说，杂文写了张三